

# 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 机制和效应\*

翁 杰 张 锐

**【摘 要】**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文章对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该制度安排会通过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户籍歧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也会通过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减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鉴于劳动力转移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阶段性差异。文章利用 1997~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结果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前期,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更大幅度的下降,但在转移后期,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因为在转移后期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将大于转移效应。文章认为,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适逢其时,改革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将有助于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关键词】**户籍制度 要素收入分配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力转移

**【作 者】**翁 杰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张 锐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

##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变动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和微观层面的家庭收入之间建立联系,而且有助于解释规模性收入分配的变动,以及对不同群体社会公正的关注(Atkinson, 2009)。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因素角度来解释功能性收入分配变动的驱动力和作用机制。例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是导致要素收入分配变动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 2009; 龚刚、杨光, 2010; 陈宗胜、宗振

---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和要素收入分配变动:理论分析和动态模拟”(编号:71273242)的阶段性成果。

利,2014);也有研究从要素价格和要素替代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中国要素市场中的价格干预和价格扭曲改变了企业的要素投入决策,致使企业用价格相对较低的资本去替代劳动,导致资本深化和要素收入分配变动(李文溥、李静,2011;翁杰、徐圣,2015)。

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不仅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如生产方式、技术变迁和结构变动)进行研究,而且有必要从“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制度经济学认为,非市场因素的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因素。如果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归结为二元经济结构,那么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会通过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工资收入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多项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实施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的后果,使这部分群体的工资收入存在明显的户籍歧视(章元、王昊,2011;余向华、陈雪娟,2012;章莉等,2014)。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该制度的实施会产生以户籍为基础的职业隔离,不仅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吴晓刚、张卓妮,2014),而且会导致整体收入差异的加大(万海远、李实,2013)。可见,户籍制度的实施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产生歧视,从而最终影响规模性收入分配。

目前鲜见有关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及其机制的专题研究。一些研究对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问题有所触及。罗长远、张军(2009)在分析外资进入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时指出,户籍制度等约束因素的存在为劳动力流动设置了障碍,削弱了其议价能力,致使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张松林等(2014)认为,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最终影响收入分配。本文认为,如果对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影响的认识仅限于此,可能会低估户籍制度的真实作用,以致对户籍制度的影响产生错误判断。户籍制度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特征事实是工资歧视和阻碍转移,一方面户籍制度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同工不同酬,即工资歧视;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存在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或直接给劳动力转移设置了障碍,阻碍其转移。如果仅看到前者,的确很容易得到户籍制度的实施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认识可能是片面的,因为户籍制度的实施还会阻碍劳动力转移,同样会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动,该制度安排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更为复杂。本文试图对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也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 二、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动和要素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假设经济中只有两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初始状态下两个部门的就业数量分别为  $N_1$  和  $N_2$ ,在  $t$  时期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

动力累计转移数量为  $N(t)$ , 两部门在  $t$  时期的就业数量分别为  $N_1(t)$  和  $N_2(t)$ , 表示为  $N_1(t)=N_1-N(t)$  和  $N_2(t)=N_2+N(t)$ 。假设经济中的就业总量  $N_0=N_1+N_2$  保持固定水平不变。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别表示为  $y_1$  和  $y_2$ , 人均劳动报酬分别表示为  $w_1$  和  $w_2$ 。假设农业部门中产出全部为劳动者所得, 人均劳动报酬等于劳动生产率, 满足  $w_1=y_1$ , 而非农部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参与和共同分配, 资本也要获取收益, 因此满足  $w_2 < y_2$ 。产出总量  $Y(t)$  和劳动报酬总额  $W(t)$  可以分别表示为:

$$Y(t)=y_1N_1(t)+y_2N_2(t) \quad (1)$$

$$W(t)=w_1N_1(t)+w_2N_2(t) \quad (2)$$

若初始状态下的产出总量表示为  $Y_0=y_1N_1+y_2N_2$ , 劳动报酬总额表示为  $W_0=w_1N_1+w_2N_2$ , 则发生劳动力转移后的产出总量  $Y(t)$  和劳动报酬总额  $W(t)$  可以分别表示为:

$$Y(t)=Y_0+(y_2-y_1)N(t) \quad (3)$$

$$W(t)=W_0+(w_2-w_1)N(t) \quad (4)$$

$t$  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  $LS(t)$  可以表示为:

$$LS(t)=\frac{W(t)}{Y(t)}=\frac{W_0+(w_2-w_1)N(t)}{Y_0+(y_2-y_1)N(t)} \quad (5)$$

#### (一)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为了直观显示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假设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劳动报酬均不随时间变动而变动, 该假设比较符合 Lewis(1954)劳动力转移模型中第一阶段的特征, 即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式(5)对劳动力转移数量  $N(t)$  取导数, 整理后可以表示为:

$$\frac{dLS(t)}{dN(t)}=\frac{(w_2y_1-w_1y_2)N_0}{Y^2(t)} \quad (6)$$

在式(6)中, 由于农业部门的人均劳动报酬等于全员劳动生产率, 即  $w_1=y_1$ , 式(6)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frac{dLS(t)}{dN(t)}=\frac{w_1(w_2-y_2)N_0}{Y^2(t)} < 0 \quad (7)$$

式(7)表明,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会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收入份额的部门差异, 非农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农业部门。因此, 在工业化进程的某些时期, 当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 非农部门产出占整体经济产出总量的比例逐渐提高时, 表现为结构变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 (二) 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首要机制是源于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户籍制度使农村转移劳动力不能享受那些城镇劳动力享受的正常权益, 而且农村转移劳

动力的工资水平会明显低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户籍歧视(章元、王昊, 2011;余向华、陈雪娟, 2012;章莉等, 2014)。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非农部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歧视一直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不交社会保障费用等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均是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户籍歧视引起的,其实质可视为企业没有向农村转移劳动力支付与城镇劳动力一样的报酬。假设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企业支付给转移劳动力的报酬水平  $w$  表示为:

$$w = \alpha w_2 \quad (8)$$

式(8)中的系数  $\alpha$  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指标,  $\alpha \in (w_1/w_2, 1]$ 。  $\alpha$  越大,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越接近城镇劳动力,即户籍制度越宽松。  $\alpha$  越小,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差越远,即户籍制度越严格。存在户籍制度的劳动收入份额  $LS(t)$  可以表示为:

$$LS(t) = \frac{W(t)}{Y(t)} = \frac{W_0 + (\alpha w_2 - w_1)N(t)}{Y_0 + (y_2 - y_1)N(t)} \quad (9)$$

将劳动收入份额对户籍制度宽松程度  $\alpha$  求偏导,得到:

$$\frac{\partial LS(t)}{\partial \alpha} = \frac{w_2 N(t)}{Y(t)} > 0 \quad (10)$$

式(10)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宽松的户籍制度会提升劳动收入分配,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则具有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宽松的户籍制度意味着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程度较低,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则意味着工资歧视程度较高。可见,户籍制度的实施具有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

上述结论显然没有考虑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第一转折点之前,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不受生存工资的影响,但在第一转折点之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受非农部门工资水平的影响,非农部门要继续从农业部门获得更多的劳动力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此时两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竞争态势。因此,劳动力的转移数量  $N(t)$  应与户籍制度宽松程度  $\alpha$  相关,并满足  $\partial N(t)/\partial \alpha > 0$ ,即宽松的户籍制度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实施转移,而且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逐渐降低。户籍制度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得到多项研究的支持(梁琦等, 2013;刘军辉、张古, 2016),这些研究均认为,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那么,式(10)就可以表示为:

$$\frac{\partial LS(t)}{\partial \alpha} = \frac{w_2 N(t)}{Y(t)} + \frac{[(\alpha w_2 - w_1)Y_0 - (y_2 - y_1)W_0]}{Y^2(t)} \frac{\partial N(t)}{\partial \alpha} \quad (11)$$

其中  $\partial N(t)/\partial \alpha$  前面系数的分子可以表示为:

$$(\alpha w_2 - w_1)Y_0 - (y_2 - y_1)W_0 = (\alpha w_2 - y_2)w_1 N_1 + (w_2 - y_2)w_1 N_2 + (\alpha - 1)w_2 y_2 N_2 \quad (12)$$

式(12)右边的3项每一项均小于0,因此式(11)的结果就变得不确定。如果将式



(11)右边的第一项视为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那么第二项就是户籍制度的转移效应。当 $\partial N(t)/\partial \alpha$ 满足式(13)时,此时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小于转移效应, $\partial LS(t)/\partial \alpha < 0$ 成立,表明户籍制度的放松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当 $\partial N(t)/\partial \alpha$ 满足式(14)时,此时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大于转移效应, $\partial LS(t)/\partial \alpha > 0$ 成立,表明户籍制度的放松反而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frac{\partial N(t)}{\partial \alpha} > \frac{-w_2 N(t) Y(t)}{[(\alpha w_2 - w_1) Y_0 - (y_2 - y_1) W_0]} \quad (13)$$

$$\frac{\partial N(t)}{\partial \alpha} < \frac{-w_2 N(t) Y(t)}{[(\alpha w_2 - w_1) Y_0 - (y_2 - y_1) W_0]} \quad (14)$$

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既可以通过工资歧视,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工资效应和转移效应是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两种主要路径。因此,户籍制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变得不确定,具体要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综合和权衡。

### (三) 户籍制度变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阶段差异

假设劳动力转移决策具有异质性,或者假设劳动力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在不同的阶段存在差异,在劳动力开始转移的初始阶段,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的弹性比较大,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劳动力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的弹性开始逐渐变小。上述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基础。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初期,户籍制度的略微放松就可以促使大量劳动力做出转移决策;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后期,那些仍旧沉淀在农村的劳动力的转移意愿往往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户籍制度发生较大程度的放松,也不足以改变其转移决策,表现为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弹性的逐渐下降。因此,转移数量满足 $\partial^2 N(t)/\partial \alpha \partial t < 0$ 。根据这个条件,可以将 $\partial N(t)/\partial \alpha$ 随时间 $t$ 变动的态势描述如图1,那么在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时点 $t'$ 。在 $t'$ 点之前,户籍制度的放松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转移效应大于工资效应,从而产生对劳动收入份额较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户籍制度放松促使劳动收入份额更快下降;在 $t'$ 点之后,户籍制度的放松不会促进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但由于此时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存量很大,因此,户籍制度放松的工资效应将大于转移效应,表现为户籍制度放松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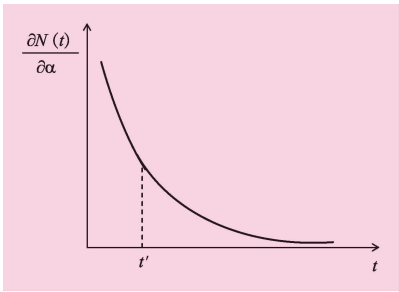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偏导数的变动趋势

### 三、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度量

对户籍制度宽松或者严格程度的衡量是本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关键,实际上,对户籍



表 1 1997~2012 年中国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变动 %

年份	市人口总迁移率(HK <sub>1</sub> )			市人口迁入率(HK <sub>2</sub> )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1997	12.81	55.55	36.19	7.83	31.42	5.88
1998	13.12	106.17	37.67	8.98	57.32	9.85
1999	13.81	126.89	39.10	9.38	68.59	11.02
2000	14.26	188.55	45.01	9.53	100.89	16.10
2001	11.36	102.14	38.44	5.27	58.28	9.71
2002	18.09	155.87	56.09	13.24	85.56	16.55
2003	16.46	264.91	73.74	12.62	144.93	26.10
2004	14.36	219.10	80.04	11.50	108.31	23.14
2005	13.99	289.34	82.04	10.62	151.42	28.20
2006	13.18	229.02	47.67	10.13	123.61	20.10
2007	14.82	152.67	43.64	11.56	83.19	13.47
2008	16.86	66.40	39.67	10.80	39.83	7.89
2009	16.05	81.05	36.21	9.64	43.09	8.77
2010	15.74	108.20	35.60	8.12	57.82	9.43
2011	13.22	180.13	34.98	7.20	92.66	15.16
2012	11.66	243.79	39.55	6.18	122.07	21.57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该数据只更新到 2012 年。

动比、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等变量。

$$\begin{aligned} \ln LS_{i,t} = & \beta_0 + \beta_1 \ln HK_{i,j,t} + \beta_2 \ln KY_{i,t} + \beta_3 \ln KL_{i,t} + \beta_4 \ln FDI_{i,t} \\ & + \beta_5 \ln EXP_{i,t} + \beta_6 \ln PFE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tag{15}$$

其中,  $LS_{i,t}$  表示  $i$  省  $t$  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 $HK_{i,j,t}$  ( $j=1,2$ ) 表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 $KY_{i,t}$  为资本产出比;  $KL_{i,t}$  为资本劳动比;  $FDI_{i,t}$  为外商直接投资;  $EXP_{i,t}$  为出口贸易;  $PFE_{i,t}$  为公共财政支出。

式(15)中的系数  $\beta_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一般而言,在劳动力转移前期,户籍制度的放松会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即户籍制度的转移效应大于工资效应,因此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在劳动力转移后期,户籍制度放松的工资效应会大于转移效应,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因此,如果考察期涵盖了这两个时期,那么系数  $\beta_1$  就可能不显著。为了验证不同阶段户籍制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本文将 1997~2012 年分为 1997~2005 年和 2006~2012 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分析,并将后一阶段缩短为 2008~2012 年再次分析。本文预计对 1997~2005 年数据的估计系数  $\beta_1$  显著为负,而后面两个阶段的估计系数将变得不显著或显著为正。

(二) 变量设定

1. 劳动收入份额(LS)。劳动收入份额变量被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据看,各省的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流动性最高省份的市人口迁移率是最低省份的 10~15 倍,表明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在省级层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四、研究方法和变量设定

(一) 研究方法

对于户籍制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利用 1997~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综合前期分析和已有研究,发现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对数模型能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于是本文采用式(15)的对数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主要控制了资本产出比、资本劳

百分比。1997~2004 年各省的劳动者报酬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2005~2012 年的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

2. 资本产出比(KY)和资本劳动比(KL)。依据各省的资本总量、产出水平和就业总量,对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进行直接度量不能很好地反映各省的经济特征,因为忽略了产业结构方面信息。考虑到 1997~2012 年各省均处于工业化时期,本文拟用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来代理区域经济水平。资本产出比被定义为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增加总值之比。资本劳动比被定义为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之比。1997~2007 年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8~2012 年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年鉴》。固定资产净值和就业人数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3. 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出口贸易(EXP)。外商直接投资定义为各省外商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乘以 100。外商投资总额通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出口贸易定义为各省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商品统计的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乘以 100。外商投资总额数据和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4. 公共财政支出(PFE)。公共财政支出定义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480)

变 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劳动收入份额 LS	31.440	66.225	47.809	6.866
户籍制度 1 HK <sub>1</sub>	11.360	289.340	47.852	34.970
户籍制度 2 HK <sub>2</sub>	5.270	151.420	26.057	18.178
资本产出比 KY	0.793	6.354	1.881	0.857
资本劳动比 KL	3.330	113.302	19.420	14.272
外商直接投资 FDI	0.111	22.956	4.597	4.179
出口贸易 EXP	0	99.328	16.140	19.658
公共财政支出 PFE	1.241	61.211	16.778	7.925

## 五、实证结果

表 3 给出了户籍制度宽松程度(HK<sub>1</sub>)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结果。模型 1 是对 1997~2012 年数据的估计结果。为体现阶段性特征,本文将整个考察期分为 1997~2005 年和 2006~2012 年两个时间段,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是对这两个时间段数据的估计结果,模型 4 是对 2008~2012 年数据的估计结果。表 3 报告的是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模型的判断依据是 Hausman 检验。

模型 1 至模型 4 的估计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呈替代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产出比下降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资本劳动比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表明资本积累和



表 3 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HK<sub>t</sub>)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LnHK <sub>t</sub>	-0.049***	0.010	-0.045***	0.014	0.035*	0.019	0.043***	0.015
LnKY	0.099***	0.016	0.089***	0.023	-0.002	0.050	0.021	0.043
LnKL	-0.065***	0.013	-0.108***	0.016	-0.025	0.022	-0.037**	0.017
LnFDI	0.004	0.008	-0.009	0.009	0.007	0.015	0.003	0.014
LnEXP	-0.059***	0.011	-0.057***	0.015	-0.044**	0.019	-0.017	0.015
LnPFE	0.051**	0.022	0.036	0.023	0.147***	0.056	-0.017	0.048
R <sup>2</sup>	0.358		0.485		0.138		0.110	
F/Wald chi2	275.66		315.79		4.56		5.02	
样本量	479		269		210		150	

注:(1)模型 3 为固定效应模型,其余为随机效应模型。(2)表格没有报告常数项。(3)\*、\*\*、\*\*\*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资本深化将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一些研究认为,资本深化在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估计结果还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而出口贸易的增长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与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Huang 等,2011)。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出口贸易和要素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并不适用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如果将问题置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动和工业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估计结果还显示,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有一定积极效应。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显示,市人口总迁移率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理论上市人口总迁移率与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呈正比,表明户籍制度的宽松反而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下降,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有助于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对户籍制度和要素收入分配关系的一种普遍性认识是,户籍制度的实施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反的证据,户籍制度的实施反而有助于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存在着转移效应,因为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1990 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 53.0%,2007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至 42.9%,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尽管户籍制度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工资歧视,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也会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沉淀在农业部门中无法实现转移就业,反而会减缓劳

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速度和幅度,有助于将劳动收入份额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因此,不能将户籍制度简单视为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的推手。

模型 2 显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模型 3 显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开始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程度较低,而模型 4 则显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劳动收入份额对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弹性系数达到 0.043。综合这些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随时间发展呈阶段性变动态势。2005 年前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 2008 年后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反而会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发生了逆转。需要指出的是,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户籍制度宽松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比较一致,都显示出显著的负效应,这与考察期的特征有关。整个考察期为 1997~2012 年共 16 年,前面阶段(1997~2005 年)户籍制度宽松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的时间达 9 年,远长于后面阶段(2008~2012 年)的 5 年,这会导致 1997~2012 年整个考察期和 1997~2005 年阶段两个估计结果一致的现象。

表 4 给出的是户籍制度代理变量  $HK_2$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效应的估计结果。4 个模型针对的时间段与表 3 完全一致。表 4 中的 4 个模型显示的估计结果与表 3 中的 4 个模型也高度一致,体现了较高的稳健性。模型 5 显示,在 1997~2012 年整个考察期中,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如果将考察期进行分段考察,模型 6 显示,户籍制度的这种效应在 1997~2005 年依然保持,但在 2006~2012 年间消失了。如果将考察期缩短到 2008~2012 年,估计结果为模型 8,表明户籍制度宽松

表 4 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HK_2$ )

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ln HK_2$	-0.049***	0.011	-0.041***	0.015	0.028	0.020	0.045***	0.016
$\ln KY$	0.100***	0.017	0.095***	0.022	-0.005	0.051	0.011	0.043
$\ln KL$	-0.068***	0.013	-0.112***	0.016	-0.022	0.022	-0.033*	0.018
$\ln FDI$	0.004	0.008	-0.008	0.010	0.009	0.015	0.003	0.014
$\ln EXP$	-0.058***	0.011	-0.055***	0.015	-0.044**	0.019	-0.020	0.015
$\ln PFE$	0.052**	0.023	0.037	0.023	0.142**	0.057	-0.017	0.048
$R^2$	0.365		0.494		0.134		0.111	
F/Wald chi2	271.80		310.16		4.40		18.67	
样本量	479		269		210		150	

注:(1)模型 7 为固定效应模型,其余为随机效应模型。(2)表格没有报告常数项。(3)\*、\*\*、\*\*\*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程度的提高反而有助于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据此可以大致判断,2005~2007年可能就是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转折时期,在这之前,户籍制度的转移效应大于工资效应,表现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将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在该时期之后,情况发生逆转,劳动力转移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降低使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大于转移效应,因此表现为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在不同的阶段,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富余程度和转移决策的异质性。在工业化进程初始阶段,即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前期,农村劳动力较为富余,这些劳动力对工资水平很敏感,户籍制度的略微放松就会促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弹性很大。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期,农村劳动力对工资水平的敏感性明显降低,转移就业数量对户籍制度的弹性也有所下降,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就业转移的影响和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基本持平,户籍制度变化并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到了转移后期,那些在农村尚未实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对户籍制度严格程度的敏感性进一步降低,即使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宽,仍不足以推动农村劳动力形成转移就业的决策。此时,如果户籍制度能够大幅度放松,对促进转移就业的效应有限,但对于已经转移就业人群的工资收入提升非常明显,即转移效应远小于工资效应,户籍制度的放宽有助于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一般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态势(李稻葵等,2009;陈宗胜、宗振利,2014),那么,户籍制度的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动态有什么影响?如果将劳动收入份额止降回升的点称之为转折点,本文认为,户籍制度的实施不可能改变劳动收入份额曲线的整体变动态势,但可以改变转折点的位置,以及到达转折点的时间。如图2所示,横坐标表示时间维度,纵坐标为劳动收入份额,假设劳动收入份额在未实施户籍制度下的转折点为 $T$ ,该点处的时间和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为 $t^*$ 和 $L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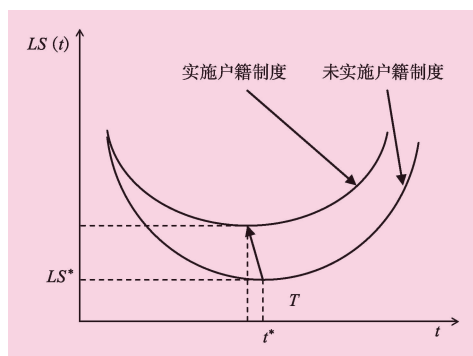


图2 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转折点的影响

可以明确的是,户籍制度的实施会使转折点向上方移动,因为户籍制度的实施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尽管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相反的工资效应和转移效应,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半期,转移效应一般会大于工资效应,最终表现为 $LS$ 曲线向上移动,带动转折点的上移。那么,转折点是向左上方还是向右上方移动?对于这个问题,由于考察的是时间维度,其中涉及的因素较多,很难有明确的判断。但

如果尝试将横坐标换成是经济发展水平,如用人均生产总值代替,可以简单推断:户籍制度的实施将使转折点向左上方移动。做出这样的推断基于以下理由,户籍制度使很多农村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未能顺利转移出来,他们只能维持在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上,这部分农村劳动力的沉淀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均有负面效应,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户籍制度实施后的转折点应该在未实施状态下转折点的左边,即经济发展尚未到达理想水平时,劳动收入份额就提前开始上升了。可以预见,在实施户籍制度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曲线将变得更加平坦。

## 六、结 语

本文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动和要素收入分配变动的框架讨论了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户籍制度会通过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和转移数量进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净效应取决于户籍制度工资效应和转移效应的权衡。在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阶段,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会呈现阶段性差异。本文利用1997~2012年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发现,总体上,实施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有助于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在劳动力转移前期,户籍制度的转移效应大于工资效应,户籍制度的放松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在劳动力转移后期,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大于转移效应,户籍制度的放松则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对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机制和效应的分析,具有以下政策意义:第一,当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且将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升高,有利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加快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2015年中国的农业部门用28.3%的劳动力创造了仅9.0%的生产总值。这说明,中国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沉淀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还很低,劳动力的转移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劳动力沉淀在农村,另一方面是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供给需求的不平衡导致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效地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在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第二,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劳动力转移意愿不足的问题。在劳动力转移后期,劳动力转移意愿和转移数量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下降,为促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有必要破除劳动力转移的“壁垒”提升他们的转移意愿。继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后,国务院又于2016年8月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试图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来破除户籍制度的“壁垒”,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市民化。政策的方向和思路是正确的,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



度障碍,将有力地促进劳动力转移。第三,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设计和实施时,有必要关注政策的互补性和联动性。户籍制度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土地制度也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为有效促进劳动力转移,有必要同时实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既提升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又消除农村对他们的牵制,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

####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宗振利(2014):《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第2期。
2. 龚刚、杨光(2010):《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3. 何英华(2004):《户籍制度松紧程度的一个衡量》,《经济学(季刊)》,增刊。
4. 李稻葵等(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5. 李文溥、李静(2011):《要素比价扭曲、过度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学术月刊》,第2期。
6. 梁琦等(2013):《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7. 刘军辉、张古(2016):《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财经研究》,第10期。
8. 罗长远、张军(2009):《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9. 孙文凯等(2011):《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10. 万海远、李实(2013):《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9期。
11. 翁杰、徐圣(2015):《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2. 吴晓刚、张卓妮(2014):《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3. 余向华、陈雪娟(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差异与机会差异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14. 张松林等(2014):《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经济评论》,第3期。
15. 章莉等(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户籍歧视》,《管理世界》,第11期。
16. 章元、王昊(2011):《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17. Atkinson, A.B. (2009), Factor Shares: The Principal Problem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5(1): 3-16.
18. Bao, S. et al. (2011), The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s Hukou Syste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9(4): 564-579.
19. Huang, X., Xu, S. and Lu, J. (2011),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Labour Income Share Vari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eviation from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The World Economy*. 34(7): 1071-1087.
20. Lewis, W.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责任编辑:朱 犁)